



燕京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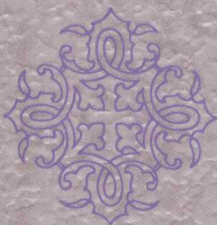
2011

*Inheriting and Shouldering of Cultur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文化的传承与担当

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燕京论坛

2011

文化的传承与担当

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

Inheriting and Shouldering of Cultur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燕京论坛)

ISBN 978-7-5097-3518-3

I. ①文… II. ①首…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9677 号

燕京论坛 2011

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

编者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黄丹 魏小薇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李娟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黄丹

责任印制 / 岳阳

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张 / 22.25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 389 千字

版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3518-3

定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左东岭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校教务处、图书馆于2003年联合创办的“燕京论坛”（最初名曰“人文学术论坛”）至今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在这6年中，世界与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论坛也伴随着这些变化经过了不断的总结与调整，但其基本原则没有改变，这就是坚持其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讲座中的许多话题是对目前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新现象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使听众能够对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及时地进行了解并理性地加以把握。其中有些话题尽管是古代的或传统的，但无论是其所拥有的观念还是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是颇为新颖的。交叉性则是指讲座内容并不限于文学的或语言的，这些讲座的题目尽管语言文学所占比例较大，但尽量囊括了所有学科领域，尤其是交叉学科领域，以便能够触类旁通。多样性则是指讲座内容的广泛包容性与个性多样化，使主讲者能够充分表达自我的学术见解与个性特色。

从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特性看，论坛的性质与大学课程的学习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学习的角度讲，它们当然可以作为课堂知识的补充，因为从这些讲座中可以了解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但论坛更重要的目的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增加见闻。因为就本质意义讲，大学既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的课堂，更是提高公民素养、提升人生境界的场所。因此，增广见闻与活跃思想乃是一所大学所必须拥有的内容。这也是

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不懈地举办人文学术系列讲座的直接动力。

讲座举办6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使本校的师生受益良多，而且逐渐吸引了其他高校的听众，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受场地与时间的限制，许多校内的师生难以全部聆听，更不要说其他院校的听众了。而我们聘请的这些学界同人，大都是国内的一流专家或者是活跃于学术前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所讲内容如果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就会浪费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鉴于此，我们依照惯例，对各位学者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征得主讲人的同意，将其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这些讲座能够使更多的人受到启迪，则此项活动非但使我校师生受益，更当嘉惠于社会也。是为序。

2009年6月30日

目 录

CONTENTS

- “国学”之由来及其当下之文化担当 党圣元 / 1
- 鲁迅的思维特征 孙 郁 / 15
- 事实与价值 陈嘉映 / 32
- 文艺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 姚文放 / 51
-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 郭 锐 / 61
- 《梁祝》故事之发展及其昆剧之示范 曾永义 / 99
- 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 陶东风 / 110
- 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与中西文学交流 赵振江 / 127
- Expanding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chievements and Weaknesses of China’s
Approach for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Junhao Hong / 138
- 重读《伤逝》：从反讽的角度看 李 今 / 171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忧郁问题 顾 彬 / 188
- 汉语方言的演变整阶与内外层次 王洪君 / 199
- 俗文学中的影子人物 曾永义 / 219
- 《台湾民报》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及其影响 朱双一 / 235
- 清末民初在华法国青年的经验与对中国现代认同的
贡献 巴斯蒂夫人 / 261
- 在接受与理解之间：中国当代小说在意大利的翻译和
传播 裴尼柯 / 274

旧学与新知的复杂交汇

- 20 世纪前期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 钱志熙 / 292
- 谈谈我关于电影创作的一些感受 苏小卫 / 313
- 重写中国文学革命史的可能 程 巍 / 323
- 后 记 张桃洲 / 351

时间：2011年3月2日（周三）18：30

地点：北一区图书馆一层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围绕《周易》与古代文学思想、道家思想与传统文论、《淮南子》美学思想、汉魏六朝学术文化与文论思想、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与审美风尚、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文学价值理论等专题展开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富有理论创见的学术见解。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道士的生活》《六朝悲音——魏晋南北朝诗歌选注评》《老子评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等，并主编《国学基础文库》《新世纪文论读本》等。

“国学”之由来及其当下之文化担当

党圣元

非常感谢有这么个机会和同学们、老师们进行交流，东风教授说让我来做个讲座，讲什么呢，第一个题目是想讲“《文心雕龙》的大文论观”，后来觉得这个太专，也比较窄。正好我在1996、1997年的时候也关注过国学问题，当时也写过两篇比较短的文章，曾经收到了一个论文集里。近十年来，我虽然没有专门写文章发表议论，但是对于国学的现状、大家关于国学的讨论以及它的学科化问题还是一直有所了解的。这样的话，我觉得讲讲国学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就补充了一些材料，今天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下面，我们一起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国学问题在当下正像东风教授刚才所言，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它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有它比较复杂的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经济上的原因。在我本人看来，国学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语之一，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国学问题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发展到当前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同时，我认为，我们谈论国学，首先必须搞清楚，一个多世纪以来，依附在国学这个概念上的种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应该搞清楚，从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国学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更多的情况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个概念，这个范畴。在当下，国学问题已经涉及了学科创立等问题，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在对国学的理解和界定上，分歧也是非常大的。当讨论的、议论的、对话的各方对所谈论的这个对象的概念的界定不一致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影响到正常对话、正常交流的。所以存在一个国学正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学”的由来这么一个话题。

国学这个词确实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但是，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它兴起于20世纪初，就是章太炎、梁启超所谈论的时候。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学大兴于天下，谈论的人就多了。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思想、学术空间逐步得到拓展，可以说，1990年之后，人们又逐渐开始谈论“国学”，一直到现在。

近代以来，“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于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这就是国粹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当时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学”。谈到国学的时候，在1927年，由当时的著名学者许啸天编辑整理的，由群学社出版的《国故学讨论集》是值得关注的。在我印象中，后来（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把这本书重新排印了，所以新的版本是有的。从

这本书的目录大家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国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从该书所收的论文篇名可以看出。这本书一共收入62篇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分门别类，有“通论”、“学的讨论”、“书的讨论”、“人的讨论”四大类。例如第一册又分为两集，第一集包括《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再谈谈整理国故》，是东南大学国学研究院提供的，这个国故和上面的国学是通用的。第三篇是《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第四篇是《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然后是《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等等，这是一个系列。第二集比较专，有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还有梁启超在清华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面就更专了，包括“经学之派别”、“两汉经师传授系统表”、“墨学讨论”、“中国文学史的大概”等，这些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都属于国学这个范畴。第二册是关于“书”的，有《史记》《战国策》《春秋》《诗经》《楚辞》《荀子》《墨子》《离骚》等，还有专门讨论中国的经书的，这一册所收的是这些东西。那么第三册呢，是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人物的，有宋明理学家、孔孟、杨朱、墨子、商君、王船山、黄梨洲等。那么从这里面来看，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当然也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其实，我们可以对大家心目中认可的国学所涉及的范围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如果按现代学科来分的话，可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如果以思想流派来划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另外一种分类法，是按《四库全书》分，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此外，国学大师章太炎出过一本《国学讲演录》，他在该书里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这对现在所说的国学是有重要参照意义的，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分类法。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上产生于清末。为什么在清末产生呢？因为更早之前它是指一个学校，如国子监、太学等。在清末的时候，欧美学术已经传入中国，人们把它称为“新学”或是“西学”等，那么与之相对，人们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者“国学”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就是这个词。现在我们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同时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也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

画、音乐、易学、算术、医学、星相、建筑等，它们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围。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这一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严格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明确的界定。有几种影响比较大的说法，其中一个是在20世纪初著名的国粹派邓实，他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应该说，这个概念很宽泛，主要强调了国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因为文章发表在辛亥革命以前，所以还体现了一种推翻清王朝的意味。邓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广东顺德人，是章太炎的追随者，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政艺通报》，又在1905年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印行《国粹学报》，主要宣传“排满革命”。邓实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多，但是政论文是他所擅长的，比较有名的有《国粹保存论》《国学真论》《古学复兴论》等，所以在当时，他是国粹理论的主要构造者之一，柳亚子曾经称赞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要关注近代以来国学的发展，邓实是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

另外，章太炎有一本书叫《国学概论》，他在其中也给国学下过定义：“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可见，在章太炎这个概念里，已经把神话、宗教、小说传奇排除在国学范围之外了。在谈到治国学之方法时，他说：“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库全书》应该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乾隆年间由纪晓岚、戴震等一流的学者集体编纂完成的，“四库”主要指的是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的是所收的都是全本的。那么国学呢，应该说，不管概念多么不同，界定多么不同，但是它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学术思想的精髓，这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国学的时候，对《四库全书》里的这些也应该有所了解。当然，《四库全书》里的分类，一个是经部，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易类”、“书类”等，大家可以在图书馆里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知道到底有些什么，究竟是怎么分类的，这里不一一念了。史部主要指的是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其中又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等。什么《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包括在内。子部呢，主要指诸子百家和释道类著作，“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等。集部呢，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及谱录方

面的内容，如李白、杜甫、谢灵运这些人的著作都收在集部里面，这是一个背景式的介绍。

除了以上谈到的邓实，另外还有几个人需要关注，首先是梁启超，因为就目前查到的材料来看，在近代以来的国人中间，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我们所说的国学这个词的就是梁启超。在1902年，他曾经有一个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和黄遵宪进行商量，并且想请黄遵宪和他一起来做这个事。如果说梁启超这次提到“国学”，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几个月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这篇文章中，他就正式提出了“国学”的概念。针对当时的形势，他说大家都喜欢“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都不太关注，梁启超担心长此以往，中国的文化、学术就消失了。但是，梁启超当时也认为，西学的输入，当然对国学也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倡扬“国学”，“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再就是在1903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又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的需要（例如在日本建立国学图书馆），也就是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不要忘了国学。其次就是章太炎，章太炎最初提倡国学，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一种排满复汉的情绪在内，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传统文化本位立场，这是一个方面。同时，章太炎提倡国学，对当时的学术风气也是有所针对的，这体现了他在学风方面的主张。在1907年12月20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12期上，“社说”栏目中发表了章太炎的《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学名国粹”，如何如何。针对当时大家大谈主义、理论这种思潮性的东西，而置真正实实在在的，如乾嘉学派、汉学这些中国传统于不顾，他提倡国学。他提出“字字征实，不蹈空言”等主张，都是乾嘉学派的一种治学方法。章太炎是一个朴学大师，他倡扬他的学风，有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到了1928年，章太炎改定了《自定年谱》，其中讲到了“革命而不废学”，这也表明了他的一种心迹。

在20世纪初，不管是章太炎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对国学的执著，实际上体现了这些倡导者对于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一种价值认同。当然，面对西学的传入、革命思潮的流行，其中也不乏来自于文化情感层面的原因。

另外，当时邓实等人发表了《国学保存会简章》，其主旨是八个字：“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当时倡扬国学是持一种什

么样的态度。如果要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些材料找起来都并不难。还有，当时北大研究所有个“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还规定了“国学”是其中的一科，从这几方面也都可以看出国学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总之，要讨论国学，在20世纪早期，有以上这么一些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此外，还有几个词语需要大家辨析一下，就是关于“国学”、“国故”、“国故学”，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国学”和“国故学”两个词而言，如果说“国学”是外来转借的，属于古义的延伸，那么“国故学”则是近代学者新造的一个词。因为在更早的中国古代，谈到“国故”时，它是指国家遭受的凶、丧、灾难、战争等重大变故。最早在近代意义上经常使用“国故”一词的应该是章太炎，他在1910年《国故论衡》一书中，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国故”范围，从而大大地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含义，基本上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因为章太炎当时是一个颇负声望的大学者，他振臂一呼，人们纷纷响应。所以从章太炎开始，“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还有一个词是“国故学”，这个概念应该是由毛子水提出来的，他是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在1919年4月，毛子水撰写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他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

从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世纪以来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9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学术出路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近代讨论的“国学”一词，最早是梁启超从日本那里转借过来的，应当承认，最初这个名称是力图彰显本国固有的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因为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屡屡将国学一词和外来的“新学”、“外学”对举。要追究它的近代含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泛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国学门”正式开办的时候，也是这么回事。从20世纪初以来，国学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这在前面曾提到过。现在有种种看法，在谈论国学的时候，往往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出现一些分歧。有的人认为，一谈到国学，

脑子里会立刻想到复古守旧。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观念对人们认识国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一提起国学，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其实 21 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融会中西、沟通古今，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流。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国学与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更不应该将其意识形态化。“文革”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或 90 年代初期，人们重新谈论国学，其中有一些观点和认识，就是把国学作为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替代物，有这样一种色彩在里面。但是把国学过于意识形态化是不利于国学的发展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传承革新的角度来认识它。我认为，给目前学术、文化、思想中的“国学”如此定位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振兴民族精神，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当下的文化，应该是新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建设任务。在文化建设方面，要“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这在当下思想、文化、学术方面是应该达成共识的。确实，当代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吸收，如果我们割断了和传统的联系，那就没有发展可言，更不要说我们的学术、文化、思想有什么特色了。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这应该是文化、学术、思想发展方面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自然属于辨别精华与糟粕之范畴，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从当前的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来看，国学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它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价值作用，21 世纪的中国文化不能没有国学的参与。这样说来，国学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当代文化场域，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场域，并且理应对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乃至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消费带来一种明显的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時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

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地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它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事实上，我们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才能为传统文化、为国学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现实的生长点，而传统文化、国学的当代命运也正系于此。这是它在当前的一种文化担当。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会说，你开始不是说对国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定吗？过于严格的学术上的界定是没有，但是国学指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学问这样一种大的共识应该还是有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方面是应该重视的，就是一方面要为国学正名，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个正名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就相应地会发展变化。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我认为大家要认识到，国学并不是个一成不变呆板而僵硬的东西，它的内涵和外延虽然应该有相对的界定，但它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章太炎，他把神话、小说传奇、宗教排除在国学外面，但是我们现在讨论国学外延的时候，就不一定完全同意章太炎的看法了。所以说，20世纪20年代章太炎、梁启超包括吴宓等人所谈论的国学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学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而且以后，未来人们对国学内涵及外延的认定也不见得会等同于我们现在的看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必强迫自己完全等同于前人，更无法要求后人永远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认识基础上。换句话说，我们大可不必非得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国学”这个概念。我个人的一点认识是，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和使用，除了要遵守一种学术上的原则和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外，更应该尊重现实的要求和条件，不可人为地拘泥刻板起来，也不必过于执著于“传统”和“现代”的分别，应该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谈论到“大国学”，说是在国学学科化的建构中，涉及了西方的汉学和西方的中国学，这个我们在后面可能要提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发表的文章中这么界定，所谓“国学”，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一种学问，它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存留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指归。一般说来，它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存在的传统文化遗产，二是对这一遗产所进行的发掘、整理、分析和评价说明，

前者属于客体范畴，后者属于主体范畴，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涵容，构成一种统一的状态，共同产生作用和影响，从而展现出丰富的过程和现象。因为我一直是做文学理论研究的，所以有一个癖好，就是遇到一个东西总想下个概念、做个界定。国学作为一种文化和学术类型，不外乎由两个方面构成，这也说明了国学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内涵。我在1996年和1997年分别发表了《国学琐议》和《国学再议》。我们谈论的国学，是中国本土的国学，我们是在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谈论的，所以我们谈论的国学不包括那些外国学者以中国文化为对象的考察与研究，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学术活动称为“汉学”或“中国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国学”之“国”当然是中国，同时又具有祖国文化、母体文化这么一层文化情感。这是当年的一个观点，不过到现在十几年了仍没变，我还是这个想法。近年来谈论国学的时候，好像是要一网打尽，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学”的研究也认为是“国学”，但是那不是他的“国学”，而是他人的“国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倡导国学，不是为了回忆和重温我们昔日文化的灿烂和繁荣，也不单单是为了再现这一辉煌，而是负有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明推向更新更高境界的使命（这是当下的担当），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当代文化氛围中的国学应当具有更加博大的包容性，更加积极的开放性和更加鲜明的现实性。

在我们谈到传统的时候，不能否认传统存在精华和糟粕，国学也有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谈到国学的时候，人们又把“国学”和“国粹”等同起来。在章太炎和邓实那个时候，“国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国学”，但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北大的学者们一般不用“国粹”来指“国学”，而是用“国故”。到了现在，一般说来，“国粹”主要是指京剧等技艺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学”。所以，“国学”和“国粹”是两个词，既有联系，又各有所指，这是需要辨析的一个方面。此外，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经济化，商业气息大量侵入文化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复古氛围也很浓厚，人们在这方面也可能对国学提出一些诉求。所以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现象，一谈到国学，就想到它是一种古香古色的老学问了，它可能是那些纯粹雅好博古的学者们自己在书斋里的事情，与现实是不可能搭界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国学从晚清民初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非常自觉地成为参与当下文化建设的一个渠道，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20世纪初的学者们，在谈论国学的时候，是极为关注当下文化的走向的。因而可以说，现

代意义上的国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实品格。如果谈论的国学不涉及当下的文化建设问题，是不足以成为“国学”的。所以说，文化的担当意识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国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无论是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所处的语境来看，还是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格局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对其他外部的或异质的文化的回应，已经显得十分不够；从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东方文化的代表而欲与西方文化一争高下或轮流坐庄，似乎也显得不够圆融。实际上，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国学应该自觉地将自己向“天下之学”方向扩展，这也许更贴近它的本义和指归。

从国学这个角度出发，在对传统文化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普及层面的阐释和介绍，将其推向整个社会，既可以使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又可以使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的精神得到提倡，并且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是当前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个当务之急。这方面的工作在近年来好像做了不少，《三字经》《弟子规》就不用说了，还有古典诗词的诵读等。但是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文史工作者就需要做一些严肃而认真的整理研究工作，这本身也是对学以致用精神的一种发扬。

前面曾谈到要讲讲“大国学”，“大国学”这个概念是季羨林先生在301医院住院期间提出来的。季羨林先生是这么说的，“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而不是狭义的“国学”，各民族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围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羨林先生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但是季羨林先生所做的是吐鲁番学、西域学，如果按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邓实他们所说的“国学”的范围来看的话，季羨林先生的研究就不在国学范围内，那么称他为“国学大师”是不合适的。如果从“大国学”的角度来看，那么季羨林先生自然就是“国学大师”，因为他在吐鲁番学、西域学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至少到现在还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同时，就季羨林先生所说的56个民族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来说，我是非常赞